

本刊主编：刘晓立
版式统筹：佟德钊
联系电话：0311-88643113
投稿邮箱：liuxiaoli0119@163.com

古籍保护

专刊

藏书报

2020年2月10日
总第79期

藏书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联合主办

抗击疫情， 馆界担当有为



本报讯 2020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关门、闭馆、停运、延长假期、推迟开学……面对疫情，为了让人们能安心“宅”在家，充实而有意义的度过这段特殊的日子，各地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在第一时间行动起来，延长闭馆时间，加强公共区防控，在线服务“不打烊”，数字资源、文献传递、移动图书馆、查新检索等服务均正常开展，此外，线上展览、线上讲座也陆续推出，鼓励大家用智慧战胜疫情。

第一时间整合发布优秀数字资源

1月26日，在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特殊时期，国家图书馆及时整合资源，连续推出一组深受广大网友喜爱的新春内容。此外，国家数字图书馆也为注册读者提供了种类丰富、数量众多的中文、外文资源库以及国家图书馆馆藏的特色资源库服务。

为满足读者居家学习的需要，天津图

书馆携手部分资源供应商，为广大读者朋友们献上免费的知识盛宴，包括10多万册畅销电子书、4000多种期刊、50多种报纸、50多万集经典有声读物，以及大量的古典音乐、艺术图片、线上展览、培训视频等，读者无需下载任何应用，扫码即可阅读。

南京图书馆在官网推出“网上服务更精彩”专题，通过海量数字资源免费看、自建资源、开放获取资源、少儿数字图书馆、南图讲座和网上展厅等六大栏目服务公众。其中仅“海量数字资源免费看”栏目就汇集了万方、国研网、维普、超星等数字资源，提供海量的电子书、有声读物、数据库、线上文化活动等，以供读者免费使用。此外，南图还将持续通过江苏省联合参考咨询网和江苏省工程文献平台，为广大读者提供答题和文献传递服务，切实保障读者在疫情防控阶段的精神文化需求。

而郑州图书馆、许昌市图书馆、包头图书馆、衡水市图书馆等大量地市级图书馆也持续开展了数字图书馆线上服务。

首发数字展厅， 让公众足不出户看“云展”

为了给广大读者带来丰富的假期文化，黑龙江省图书馆首发“数字展厅”，为读者朋友带来多场线上大展。数字展厅的每个展览都蕴含丰富展览内容，每个展览由3-5个展厅组成，每个展厅有20-50个交互热点，以图文、音视频、语音解说相结合，为读者介绍详尽的、深层次的展览内容。

青岛市图书馆、常州市图书馆等也纷纷首发“数字展厅”，利用三维建模或全景拍摄手段，为读者带来身临其境的真实观展体验。而国家图书馆2019年推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也已经提供了线上观展，满足读者对典籍文化的需求。

南京博物院同时开放网站、微信端在线展览（<http://fight.njmmuseum.com/>），首批推出“兄弟王——从满城汉墓到大云山汉墓”“仰之弥高——二十世纪中国画大家展”“江苏重大建设成就展”“世界巨匠——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展”“纸载

千秋——传统技艺与保护技艺”等五大热门展览，横跨古今，思接千载，让观众在手机上就可以探秘古人的日常起居，欣赏现代大师的匠心巨制。此外，在国家文物局推出的全国“博物馆网上展览平台”中，除南博外，天津博物馆、苏州博物馆等也积极行动起来，推出了一批精彩网上展览。

线上讲座，拓展学习资源

国家图书馆借鉴MOOC的大规模、开放、在线理念，与当代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紧密联系，以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依托馆藏海量资源，以专题形式设置课程。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互动模式推送不同形态的学习资源，创新打造了互联网时代图书馆社会教育与阅读服务平台。其他图书馆也纷纷启动相关线上阅读活动、讲座等，拓展读者知识面。

图书馆外，博物馆也在陆续启动服务。其中，中国丝绸博物馆就在公号上推出了2019年的讲座干货全放送，能让大家足不出户、安安心心线上参与活动，聆听大咖讲座。（综合报道）

为什么书叶会发黄变脆



特邀嘉宾：刘家真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古籍保护专家）

无论是现代书刊还是古代书籍、字画，时间长了都存在纸张发黄的现象，由此，造纸业常把纸张泛黄到一定程度或耐折度下降到一定程度所经历的时间称为纸张的耐久性。纸张耐久性表达了纸张的使用寿命或可能保存的最长时间。

纸张返黄后，纸张的机械强度也会随之下降，然而纸张发黄程度与纸张耐折度下降的程度有时并不一定成正比关系。笔者曾经见过整柜的古籍书口与上下切口都变成黄褐色

（即褐变），然其纸张却尚柔韧。日本有研究表明，纸张褐变并不一定意味着纸张的pH值较低，但pH值较低的纸一定会出现返黄，这有利于我们判断纸张是否酸化。

有研究指出，造成以上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纸张纤维被氧化或被酸化。纤维被氧化会导致纸张强度的损失和变黄；纸张的酸化则使纸张变得更脆弱，且纸张纤维的被氧化和被酸化又是相互影响的，由此可知，纸张发黄及脆化是纸张纤维被氧化和被酸化的共同结果。

1. 纸张纤维的氧化与黄变

纸张纤维主要是由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组成的，三者都有可能被氧化或是随时间流逝而自然老化，使得纸张出现黄变。

木质素是纸张纤维中最不稳定的成分，很容易被氧化，特别是在光照下氧化更快，因木质素在光氧化过程中会生成

褐色、粉状的氧化木质素，由此纸张黄变及强度下降。我国的新闻纸、低级印书纸及纸板的纸浆，木质素含量都很高，所以其纸张的黄变也迅速，在光照下，甚至可以感到这类纸张的黄度每天都在增加。在我国传统纸张中，由于竹纤维中木质素含量较高，因此竹纸就比其他传统纸更容易黄变，其柔韧性也不如皮料、藤料制作的纸张。

纸张纤维中的半纤维素和纤维素虽然较木质素稳定，但在光照和氧的作用下，也很容易发生氧化反应。即使是最稳定的纤维素，空气中的氧、臭氧、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和其他氧化剂也都可能对其进行持续的氧化，特别是在有光的环境中。氧化纤维素一改纤维素不吸收可见光的特性，而具有吸收长波长光的功能，于是我们看到纸张黄变了。再者，氧化纤维素的结构中因为不再含有羟基，所以分子间不能再

形成氢键，分子间的结合力减弱了，导致纸张干燥以至脆裂。据估计，纤维素若失去0.5%—1%的结合作用，就能够使纸张发生肉眼可见的劣化。

纤维素氧化后还会有羧基（-COOH）产生，羧基的氢氧键极性很强，易断裂而生成氢离子，因而呈酸性。这些酸性物质又会促进纤维素的水解，降低纸张的机械强度。

2. 影响纸张黄化速率的主要因素

由上可见，纸张纤维中的基本成分在氧化剂、光、湿气与高温的作用下都有被氧化的可能，但纸张黄化的速率却有可能因造纸原料及保管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一般说来，木素含量高的纸张黄化速度快，古纸木素含量少故可流传至今。现代机器纸的木素含量也并非一致，白报纸几乎由纯机械木浆抄制而成，含有造纸原料中的全部木素，且纤维粗短、脆硬，均一

性差，所以纸张的耐久性差，容易发黄变脆，尤其在阳光的照射下更甚。现代报刊杂志用的新闻纸，由于采用了80%的机械木浆，也易黄化。铜版纸采用的是去除木素的化学木浆，纸张的抗氧化性就比白报纸与新闻纸强。

同种纸在不同的保管环境中，其黄化的速率也不一样。污浊的空气、高温高湿的环境以及光照强都是最易造成纸张黄化的外界因素，需要长期保存的纸质藏品一定要在恒温恒湿（16—25℃，湿度的日较差小于2℃；相对湿度50—60%，相对湿度的日较差小于5%）的洁净环境中避光保存。晾书是不宜提倡的，让光照射在书页上，无论是在直射的日光下还是在阴凉处晾书，光都会促进纸张纤维的氧化。有人以为古书不会出现这个问题，这是因为古纸的纤维素成分高，造成的破坏行为缓慢而已。

三人谈：

参访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裴 震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是日本最著名的汉学研究机构之一，其前身是 1929 年成立的东方文化学院。当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被称为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是以庚子赔款为基础，在外务省的援助下，为研究中国文化而成立的。于 1939 年 8 月，改成现在的京都大学附属人文科学研究所，其宗旨是从事有关东亚人文科学的综合研究。

我们参观的是人文科学研究所下属的东亚人情报学研究中心，负责接待我们的是研究所的永田先生与梶浦先生。我们围坐在大会议室里，依次向永田先生与梶浦先生介绍自己的研究方向和本科专业，值得一提的是永田先生和尾浦先生都能够用中文与我们交流，二位先生也对研究所的情况做了详细的介绍。据尾浦先生说，他们的书库分为三层，按照四部分类法进行摆放，一楼是经部、史部，二楼有一部分史部和丛书，三楼主要是集部。我们进入了书库，并翻阅了感兴趣的书目，两位先生在一旁为我们答疑解惑。永田先生是日本古籍联合目录项目负责人，我们当时想看一本书，但是很可惜没有查到，张涛老师说，如果永田老师说没有的话，那么基本上整个日本就都没有这本书了。由此可见，在古籍书目整理这方面，永田老师是非常权威的。从书库出来后，两位先生还在会议室提出了几种非常珍贵的书，其中有完整的《永乐大典》，实在让同学们惊喜不已，可以说也是我离“国宝”最近的一次。

严天月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是日本最重要的汉学研究中心之一。该研究所的

前身为东方文化研究中心，收藏了不少珍贵的汉籍以及甲骨、拓片等汉学研究文献。

这一天接待我们的是永田知之先生和梶浦晋先生。他们先给我们介绍了研究院的基本情况，接着带领我们参观了研究所的书库。该研究所书库的书籍按照经史子集从的分类，从一楼往上排架；古籍与近现代书籍不作区分，一同排架。不同于一般书库，该书库并没有常年保持恒温恒湿，而是让书库温度随着季节变化。其实，最近一些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馆藏管理观点。他们认为，古籍本身就是在变化的温湿度环境下保存的，因而不应该将其置于恒温恒湿的状态下，而应该让其顺应季节变化，得以“呼吸”。另外，他们介绍道，该研究所藏书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国藏书家陶湘。陶湘（1871—1940），字兰泉，号涉园，民国著名藏书家、刻书家，江苏武进人。陶湘对于书品的要求极高，除了对开化纸本的热爱之外，他还对书籍的装帧尤为关注。书籍入藏之前，他都要亲自检查整理并觅良工对其重新装帧或修复，因有“陶装”之称。陶湘的藏书几经辗转，其中丛书 574 种 27000 册被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所购，后归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这一批书从中国天津到日本京都，在不同的气候环境下存藏，若是从保护修复的角度去研究，应是很有意思的选题。

随后，永田先生和梶浦先生还带我们去看了研究所的珍贵研究数据库。我们惊奇地发现，该研究所还藏有大量的拓片、中国考古资料（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的地图、照片等），甚至还有一些陶片、青铜器等出土文物。他们的拓片是折成统一规格，装于盒内保存的，这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做法相似，也是赵嘉福老师一直提倡的做法。这一点，复

旦大学图书馆或许可以参考。

参观完书库和数据库之后，永田先生和梶浦先生带我们看几种他们精心挑选的珍贵馆藏。其中有宋刻本《后汉书》、《赵城金藏》零种、元西夏木活字印本《华严经》零种、内藤湖南藏《永乐大典》、明刻本《唐宋丛书》、罗振玉藏《唐蕃会盟碑》藏文拓片、翁方纲藏《清仪阁古器款识》等，另外还有潘景郑、王欣夫、龙榆生等先生的签名赠本。我们看到这些珍品都激动不已，因为《永乐大典》《赵城金藏》这样国宝级的藏品虽然在国内也可看到，但也只能是隔着展柜大略观赏，绝不可能像京大人文学研究所这样让我们去近距离翻阅。也正因为近距离，我们不仅能看到《永乐大典》中有修《四库》时的借用记录，还能看到当时写工画栏线所扎的针眼痕迹。这种画栏线的方式也正是黄正仪老师所教授给我们的。原来我们也跟古人一样用着同样的方法做书。触摸这些古籍，仿佛穿越古今，真是非常奇妙的感觉。

梁旭莹

京都大学确实是我一直向往的学校，作为日本最强的国立大学之一，他们因在人文科学方面强大的研究实力而广受赞誉。

在简短的介绍以后，我们获得了特别的许可，得以进入他们的书库和储物室。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中文藏书是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从进行排列的，这在国外的图书馆是比较少见的（例如东京大学的藏书就是按照西方的十进制分类法排架的），可能也得益于这里的中文古籍藏书数量格外巨大吧，以至于我们能够看到许多在国内失传的海外孤本。在出发前的藏书调查中，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许多藏书正好是我感

兴趣的方向，例如《大藏经》《五灯会元》等释家类书籍。而在介绍中，我才得知，日本的整个汉文古籍检索系统都是由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教授主持开发的，而接待我们的其中一位先生正是这个项目的主持人。这个检索系统使得想要研究汉文古籍的人都能够快速了解古籍的馆藏地及其四部的分类，涵盖了日本各主要的高校和公共图书馆的馆藏，确实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情。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不仅收藏了古籍善本，还收藏了许多考古发现的文物，如陶、瓷、青铜等的碎片。这些文物都是不对外开放的，只提供内部的研究人员使用。此外，还收藏了许多未公开出版的照片，其中有很大的部分是佛造像的图片，主要拍摄于上世纪 40 年代以前，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在国内已经很难寻觅到了。目前，他们正在进行照片的数字化，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官网上已经可以实现初步的利用功能。

在交谈时，我提出的问题是关于日本目前藏传佛教研究和佛教造像研究的现状，京大教授回答说，在日本，藏传佛教被叫做“密教”，因为其神秘性，吸引了众多的学者进行研究。对于佛教造像的研究，日本主要集中在对其本土寺院的木质造像的研究上，对于中国境内的藏传佛教造像很少有涉猎，日本本土境内所藏的藏传佛教器物、唐卡等的数量也是十分稀少的。另外，对于汉传佛教造像中的石窟造像和铜造像的研究也较少。



纸名南疆号墨玉（一）

□浙江 汪小帆

的古稀老人，向他请教和田墨玉纸的奥秘。但人总有那么多这样那样的推诿、拖拉的说辞，我的新疆访纸迟迟未能成行，却等来了巴克老人驾鹤西行的不幸消息。所幸的是，得益于国家非遗保护政策的护航，以及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老人虽然过世了，但他的遗孀和子女依然传承着他的技艺。

时不我待，2017 年伊始，我便给自己定下了新年目标——新疆访纸行，必须的！目的地就是巴克老人的故乡新疆墨玉县普恰克其乡的布达村。

对于我这一行程，感兴趣的朋友很多，纷纷表示要随我同行，报名人数最多时，甚至能组成塞满两辆车的队伍了。可随着出发之日越来越近，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他们提出了种种理由，纷纷打起了退堂鼓。这也难怪，路程之远、时间之久、行程之苦以及种种未知因素，不是谁都有可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的。时至 8 月 9 日，离我计划出行的日

子还有 5 天，眼睁睁地看着机票价蹭蹭蹭的往上走，心头无名之火也同步飘红。难道我的 2017 南疆之行要泡汤了么？我不甘心，打算瞒着家人独走南疆。正在此时，我的小学同学突然联系到我，说得知我想去南疆，那里也是她向往的地方，想要结伴同行。柳暗花明，我内心窃喜，立马与她敲定了行程单，两人各带一只包，说走就走。当然，为了让家里人放心，我依然哄他们说，我们此去是有五六个人结伴的小分队同行。

我们飞达乌鲁木齐，在那里转机那拉提，赶上了那拉提草原上壮丽炫美的落日奇景；继而转道巴音布鲁克，虽然未见九曲十八湾倒映下的落日奇观，却跟着一帮追星少年，聊发少年狂，披着睡袋，追着看东边飘渺银河，西方的树形闪电。一路上，热情的新疆甩开舞袖，把她独特的风致展敞在我们的眼前：独库公路上的连绵花海、怪石嶙峋的库车神秘大峡谷、沙雅沙漠公路旁大片的

胡杨林以及《西游记》中的女儿国原型、龟兹高僧鸠摩罗什升坐宣讲佛法之地——苏巴什佛寺遗址，一一洒落在前行的车轮后面。我们夜宿帕米尔高原上的蒙古包，清晨醒来，就能看到被晨曦映成粉色的慕士塔格峰和卡拉库里湖；我们也曾远眺被誉为“天界红哨”的红其拉甫口岸，遥指玄奘行经处的瓦罕走廊；闲暇中，我们游走在喀什葛尔古城，花了半天时间体验当地人喝茶聊天的清闲；我们又深入喀什高台民居，遍览喀什民生市井图。迷人的景色民风，稀释了漫长艰辛的路程给人带来的疲惫与枯燥。当然，我们也领教过新疆的小脾气：在帕米尔高原上的布仑口（汉语翻译过来就是大风口），被特殊地貌形成的大风吹得跌跌撞撞，踉跄而行。终于在 8 月 23 日那天来到了和田·墨玉——我的终极目标，可以说，没有它，就没有我此次的南疆之行。

新疆以动人的风光款待了我们这些远方来客，一方山水养一方人和物，那么墨玉县又会端出怎样的风物呢，普恰克其乡布达村的墨玉纸，又会向我们诉说怎样的心语呢？



沪上童芷珍： 爱生活，爱运动，更爱古籍修复

□本报记者 王雪霞



“我是地道的上海人。”打扮精致、气质优雅的童芷珍开口清亮悦耳，让人见之听之便心生亲近之感。她自述本人爱好很多，热衷文体，喜欢去世界各地旅游，年轻时候还曾是上海市网球运动员。也许是特别的缘分，1972年底，知青返乡的童芷珍被分配到上海图书馆，从此性子活泼爽利的她开始了自己的古籍修复之路，这一做就是40年，从当时的一无所知，到今天的技艺精湛，古籍修复成为了童芷珍一生热爱的事业。

1 一辈子的事业

上海图书馆1958年建立“古籍修复组”，并有计划地开始了珍贵典籍的修补工作。1972年，为培养新一代古籍修复人才，上海图书馆到农场招回五名青年，让他们跟着老师傅们学习裱画、修书、刻字等技艺，童芷珍就是其中之一，专门学习修书。

“进来就是白纸一张。”那时才20出头的童芷珍对文献修复毫无概念：“开始的时候，就是每天跟着师傅学习修书，一般是领导分配修什么，我们就跟着一起修，和老师一起边做边学。”随着时间的推移，童芷珍等新手渐渐对古籍修复有了一定的认识，也慢慢接触到了更多的珍贵古籍，如修复馆藏宋刻本《资治通鉴》《左传》等，还参与了元刻孤本《农桑辑要》、明写本《永乐大典》的影印编订工作，“接触的古籍种类越来越多，自己的技艺也不断得到提升，就这么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其实所谓的进步都是在不断学习，不断总结，不断提高。”直到现在，有机会接触以前不了解的西文修复，童芷珍还会非常感兴趣的跟着听课，以便互相借鉴与应用。

在古籍修复事业中，童芷珍也曾干过管理，对于馆藏古籍修复，她有自己独特的关注点。“我认为馆藏单位古籍修复的注意力应加强对建档工作的重视。”现在建档工作就是把书登记一下，记录下书名、版本、破损情况、影像、治疗方案等。“我觉得后续在过若干年以后，还需要对它进行一个补充建档。”这时候就可以发现原来用的修复方法是不是有哪里出了问题。童芷珍介绍说，徐家汇藏书楼曾有一幅地图，是近代文献，非常大，大概在20年前修复，现在再次出现了问题。“如果当时有档案记录的话，就能根据它当时的状态，了解当时的修复手段、修复用材是否有问题，哪里需要再改进，从而使这次再修复能

更加完善。但是现在没有，就没有办法追溯。”这让童芷珍感觉非常遗憾。

从农村到图书馆，对于自己40年来的修复生涯，童芷珍总结说感觉一直都非常开心，尤其是很喜欢古籍修复这个工作，现在退休了也还在继续做，但更多着力于对人才的培养。除在全国参与大量培训外，她还被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聘任为修复导师。童芷珍这样的老一辈古籍修复师都是从“师带徒”模式下成长起来的，经过不断在实践中摸索、学习、总结、提高，一点一点磨练着技艺。而今天古籍修复专业的学生，不仅有专门的老师教授技艺，还有着扎实的理论知识做支撑，童芷珍坦言：“现在的学生是幸运的，文化层次比较高，他们的任务就是‘学习’，接触各种各样的古籍修复，平台非常好，学得也非常快，两年学下来对古籍修复这一套就理解得非常深刻了。”言语中充满了羡慕。

2 修复更重要的是“动脑筋”

40年来童芷珍参与修复的东西很多，顺手拈来都是案例，其中，她特别讲到了康有为手稿。手稿因为是随手写的散页，当时是插在信封里保存的，童芷珍接到的任务是要把它变成一册一册的，方便在书库中保存。那对于这样形制不一的东西，如何变成一册书呢？童芷珍介绍说：“真的需要动脑筋。”经过反复思考和尝试，最终，童芷珍做成了一本传统线装形式的书，打开之后内容只有很窄的一条。“还遇到过一件手卷形式的家谱，一般来说家谱都是‘书’的形式，以‘手卷’为形式的极为少见。当时此卷家谱破损得非常厉害，长度也很长，仅内容部分就有六七米，再加上引首拖尾约10米，上面还绘有彩色的人物画像，修复的时候就要考虑很多方面，如场地问题、修复画像中的褪色问题，等等。”比如，考虑到画像的褪色问题，童芷珍摒弃了一般修复古籍时把糨糊直接涂在原件上的做法，以避免糨糊中的水分在原件上的渗透，而是采取了把糨糊涂在修复纸上的做法，保证画像不褪色。

藏于徐家汇藏书楼的十六幅《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铜版画，系乾隆年间由国内四人绘制后送法国镌刻铜版的印刷画。当时从画出草稿到印制完成历时十一年，作品为纯西洋画风，镌刻细腻精美，印刷考究，代表了当时欧洲铜版画镌刻印刷的最高水平，是中西文化融会交流的杰作。由于年代久远，其中不少镜框已支离破碎，画面由于光照、灰尘、纸张老化、虫蛀等原因，亦需重新修整。“修复这些铜版画时，每个修复手段、使用材料等各个环节都要格外注意不能有损原件，所以，我们每次洗的时候都用蒸馏水，坚决不用化学制剂；对有蛀虫的画面及断裂的法文说明牌进行修补时，按整旧如旧的原则，修的时候尽量减少伤害；对新制作的镜框材料除了保证不会对原件造成伤害外，对底板也作了防虫防霉处理，即在底板上喷洒防虫药。因脱酸技术当时还没有得到科学验证对原价无损，脱酸时，只是在反面稍微洒一些，同时放一张手工宣纸，减少对原件藏品的损害。”童芷珍介绍说，修复最重要的是修旧如旧，延长原件的保存期限。

还有一次，一位私人藏家送来了一册破损极为严重的明代刻本，书页是已失去韧性的竹纸，而且曾经被不懂修复的人修复过，直接用糨糊将破损的书页粘在一起，有些还用厚的机制纸粘贴，童芷珍看到非常心疼，为了修复这一册书，她尝试了很多方法，花了大量时间想办法揭开，然后再修复，最后做成了金镶玉的形式，对原件进行保护。

多年来童芷珍的修复工作主要服务的对象来自三个方面，一个是上海图书馆馆藏，一个是其他馆藏单位的藏品，如邓小平纪念馆、宋庆龄纪念馆等，还有就是私人收藏的藏品。而修复的类型也不仅仅是古籍，还有家谱、手稿、手卷、字画、扇面，甚至是照片，正因为服务对象不同，修复类型多样，也极大地锻炼了技艺，经常需要根据修复需求，开动脑筋，不断创新修复技艺，争取达到最佳效果。“尤其是民间收藏的藏品，常常是情况复杂。”童芷珍介绍说，处理这些不同形制、不同破损情况的古籍，一方面就是大量实践，另一方面就是要积极开动脑筋，而“费脑筋的功夫绝不亚于动手”。这也是古籍修复的挑战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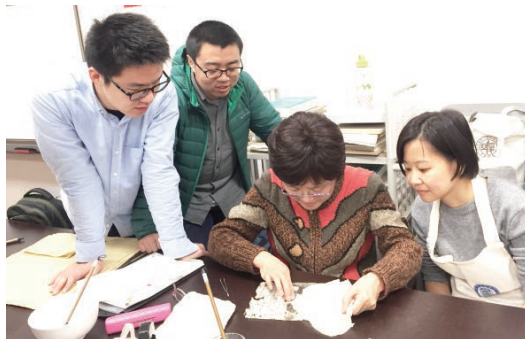
3 比矛盾更重要的是交流和包容

如今的童芷珍已经从修复岗位退休了十多年，并把工作的重心转向了教学。“教学方面我主要是把握了两个重点，一个是掌握易于让学生接受的教学方法，一个是教材的建设。”教学方法上，童芷珍会把古籍修复需要掌握的知识点和技术分成几大块，对学生进行传授，帮助学生梳理知识，循序渐进全面掌握修复技艺。而在教材的建设方面，童芷珍更是做出了突出贡献。对于动手能力更强的古籍修复者，写文章往往是一个“头疼”的事儿，但童芷珍却有不少文章发表，也有专著出版，有的还成为了古籍修复的教材。“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的陈老师说要我去写一本教材，后来根据他的要求，我花了大概快两年的时间，主要从实践方面写出了一些古籍修复必须掌握的技能和基本知识，包括糨糊怎么制作，材料怎么加工，补洞怎么修补，明矾怎么使用……有数据，有步骤，有过程，有案例，并把涉及到的古籍、拓本、手迹等不同形制进行归类，还提出了一些需要注意的方法，成为现在学生学习的必备工具书。”对童芷珍来说，每件事情都要努力做好是她对自我的要求。

近年来，古籍修复行业变化很大，童芷珍深有感触：“特别是国家教育部和文旅部出台了一些相关文件后，全国各地都非常重视，许多高校都纷纷来拜访洽谈，沟通学校开办这个专业的可行性。”作为专家，童芷珍在退休前就被多家单位邀请去上课，从专科，到本科、硕士，再到博士，童芷珍全部都接触过，同时，她认为在古籍修复人才培养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专科的学生毕业了，动手能力很强，其实随便到哪个单位都能马上上手，但因为学历不够，无法实现就业。而对研究生来说，虽然学习了这个专业，但毕业后要每天都坐在冷板凳上修修补补，又不是他们理想的工作。这就是一个矛盾。”“现在还有一个矛盾，许多学校都开办了这个专业，培养的学生分配到哪里？”

尽管对人才培养还有一些担忧，但童芷珍

对修复的传承和事业的发展前景却非常看好。首先，现在相互间交流学习的机会很多，曾经所谓修复因地域条件差异产生了南派北派，而现在不管是南北的，还是世界的，都要不断的交流融合，“最重要的是把好的东西继承下来”。其次，对于古籍修复行业中坚持传统与突破创新之间的矛盾，童芷珍也表达了非常包容的态度，她认为，不管是传统还是创新，目的都是一样的。“要保持传统的也可以，因为其实传统在当时也是创新的，都是使用之后觉得好，才传下去变成了传统。那么现在，特别是年轻人喜欢创新的也可以，如果新的方法对古籍修复或者古籍保护特别有作用，然后又传承下去了，将来若干年以后，又变成传统的了。”童芷珍说：“这些并不矛盾。”



谈到培训班、传习所、高校的专业教育等多种人才培养模式，童芷珍认为各有优势。高等专业的教育是比较全面的，涉及到整个修复的过程，老师都会把每一道关于古籍修复的技艺面面俱到讲授到，还有一些理论知识，但是因为课时短，一个学期才不到20节课，所以会不精。培训班是可以带着问题去开展学习，有针对性，学习的人也有基础，比如专门针对尺牍的，专门针对拓本的，会把这个专门问题解决掉。如何做到最好？则要求老师一定把课程内容编排得精细，“我认为现在的培训班是非常好的方式，还要充分利用起来，要有质量。”

琳琅珍籍的装帧与修护

□山东艺术学院 罗 兰

卷轴装

卷轴装是一种图书的装订方式，它将纸黏结成长幅，以圆棒作轴杆，从左至右卷成一束而成，在东汉至宋初最为流行。存世的敦煌遗书，绝大多数都是卷轴装。我们现在常用的成语“开卷有益”“手不释卷”就是从卷轴装而来的。傅咸（239—294）的《纸赋》曾说，卷轴装书籍的特点是“揽之则舒，舍之则卷”。比较讲究的经书在抄写之前，纸张要“入黄”，即古人用黄檗树的树皮、果实作为黄色染料进行染纸，以驱蠹虫吃书，防止虫蛀。古代称书为黄卷，渊源有自啊！

在大展第一展厅“国宝吉光”中，我们看到了国家图书馆藏唐写本西晋陆机撰《辩亡论》，全文分上下两篇，上篇主颂诸主，下篇扬其先功，探讨吴国灭亡原因。此写本为上篇，为《文选》写卷的零篇，黄纸墨书，工楷写就，字体舒朗俊秀，是敦煌唐人写本中的翘楚。这本卷轴装《辩亡论》中显而易见涂抹与修改的痕迹，且蕴含了“信口雌黄”的来历和渊源。首先，古人在黄纸上写错字就会用雌黄这种颜料把错字涂满，待干后再修改错字，不仅做到颜色统一内容正确，还节省物力财力，免去去掉补字再重写之忧。在那个时候，古人就已经用这种修正方式保护书籍，充分展现了古人的智慧与审美创造能力，其对古籍的研究用心程度实在令后辈感慨。其次，为了方便卷舒，防止折损，又在曝露于最外边、容易磨损的卷子右端留出一段，用纸、罗或绢包起来，以保护正文文字不被磨损。卷轴收卷之后，有些书卷还会用纺织品裹封，以便保护书卷免于灰尘、水污及虫鼠的直接损害。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许多经卷、文书均用纺织品的书帙封装，有的还包了两层。再者，为了保护经卷不被污染，防止蠹虫侵害啃噬，诸多经卷在背面用蜡板打磨至光滑，此方法在书画装裱中得到广泛运用。现在国图修复师将此卷只在上下两边托了一层薄薄的皮纸，并且颜色略浅于原纸，遵从了“宁浅勿深”的修复方法和“最小干预”“修旧如旧”“可逆性”的修复原则，保留了古人的装帧形式，也最大限度保护了古籍的原始面貌和现存状况。



经折装

经折装是中国古代佛教信众借鉴印度传统装帧方式梵夹装的优点，而对中国传统装帧形式卷轴装的一种改进，大约出现在唐中叶以后。具体办法，是将长条的卷子装佛经，依一定行数左右连续折叠，最后形成长方形的一叠，再在前、后各粘裱一张较厚的纸，作为护封，也叫做书衣、封面。由于是改造佛经卷子装而成为互相连属的折子装，故名经折装。

经折装吸收了梵夹装容易翻检的优点,而且在古籍保护方面又有发展。其一,不需要穿绳,对纸张没有损害,能延长古籍的寿命。而且经折装制作简便,利用这

个方法，已有的卷轴装佛经能很容易改装成经折装。经折装与梵夹装相较的诸多优势，注定了其很快取代梵夹装，成为佛经中最为通行的装帧形式。后来道教信徒，甚至现在很多寺院印制佛经也使用这种装帧形式，其生命力之强，可见一斑。其二，在国图大展“百代芸香”展厅有一册海华堂藏《太上三元赐福延生经》，全称《太上三元赐福赦罪解厄消灾延生保命妙经》，此本为经折装，羊脑笺泥金抄本。何为“羊脑笺”？古笺纸名，清沈初《西清笔记》云：“羊脑笺以宣德磁青纸为之，以羊脑和顶烟墨窖藏久之。取以涂纸，研光成笺。黑如漆，明如镜。始自明宣德间，制以写经，经久不坏，虫不能蚀。”羊脑笺是用羊脑和墨混合，因含有蛋白质、卵磷脂、油分，使其易于涂刷纸面，而后产生一层具有厚度的亮光表面，这会使金汁书字体不易下沉于纤维中，且色泽含蓄静谧，配以泥金书写、制图，历久弥坚。从此也可以看出古人珍爱古书的门径可谓周全细密，精妙不已。



蝴蝶装

蝴蝶装简称蝶装，始于唐末五代时期，盛行于印刷术普遍应用后的宋元，刚好适应雕版印刷术的需要，即有着两个连续的页码刻在一块板上的特点，它是把书页依照中缝，将印有文字的一面朝里、对折起来，再以中缝为准，将全书各页对齐，用浆糊逐叶粘连版心，最后裁齐成册的装订形式。用“蝴蝶装”装订成册的书籍，翻阅起来如蝴蝶两翼翻飞、飘舞，故名之为“蝴蝶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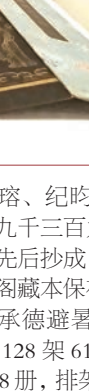
大展第一展厅国家图书馆藏《册府元龟一千卷》《文苑英华一千卷》均是这样的装帧形式。此二书均为“宋代四大书”的行列，页距较大，行格疏朗，刻写精美，颇有神韵。《册府元龟一千卷》其规模更是居四大书之首，数倍于其他书。蝴蝶装古籍在保护方面又有新的发展，一是书皮是用硬纸板制作的，版心在内，对版心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减少翻阅带来的磨损及伤害。二是浆糊固定，浆点在书脊处附有竖帘纹的皮纸，有效增强了古书的弹性和拉力，对于延长古书的寿命大有裨益。国图将其书平置并为蝶装本设置了有凹槽的放置架，是因为书根处写字，这样的陈列可保护字体免遭磨损，对古书的存放也是有益的，不仅适应书籍底部展开后的弧度，而且能减轻这些珍本陈列后变形的情况。此外，古籍在重装的时候接天头地脚或是做成金镶玉的形式，目的就是尽量保护古籍的文物价值和资料价值不受损失，这就要求在修复过程中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和修复手段，对古籍进行再保护。书品宽大且耐观，用起来也方便。这样，前人在阅读使用古书时，于留白处做笔记或者留给后人做批注，对字体的掩盖和伤害就随之淡化了，能提高古籍的阅读质量，对

于了解古籍的深层内涵是有锦上添花之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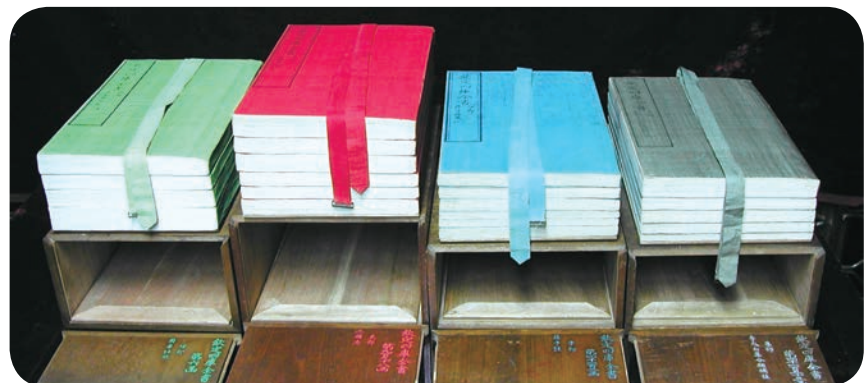
包背装

包背装起源于北宋后期，元明时书籍装帧多用此式，是针对蝴蝶装容易脱叶散乱而创造出的一种装帧形式。它是将书页背对背地正折起来，使有文字的一面向外，版心朝外，然后将书页的两边粘在书



脊上，再用纸捻穿订，最后用整张的书衣绕背包裹。书皮的装法是一张包过的，与蝴蝶装相同。其无空白页，相比蝴蝶装来说是一种进步。

在大展第一展厅所见到的国图藏清乾隆内府写本清永瑔、纪昀等纂修《文津阁四库全书七万九千三百九卷》，就是原函包背装，该书先后抄成7部，仅文渊阁、文溯阁、文津阁藏本保存完整。文津阁《四库全书》原藏承德避暑山庄，1915年拨交国图。全书128架6144函36304册，另总目20函128册，排架图4函4册。存世四部《四库全书》，惟此原架、原函、原书保存完好。包背装最大的特点就是牢固，它对于古书的保护可以体现在：靠浆糊和两个纸捻固定，做纸捻用拉力好的皮纸，很难用人力因素将其扯断，更不用说其他外力因素，有效增强了书的牢固程度，潜在的保护了古书的坚韧度。此外，蚂蟥攀在古书接背时的连接作用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内府的装帧形式中，有的将书签镶嵌在书衣里面，看起来是凹进去的，其美观及用心程度堪称精绝。这其实是保护文字的一种方法，避免堆积的古籍相互刮蹭产生的毛刺，而且一个不小心就可能使得书签脱落飘零。从装具上看，小到装书用的函套、书匣、书箱、书盒、书柜，大到书房、藏书堂、藏书楼都是为了保护书籍的完整性，特别还有的书柜设有帘子，更是阻隔了外界对书籍的干扰，做到既预防又保护，既典雅又实用。



线 装

线装书起源于南宋初年并在明代万历以后盛行。它是由蝴蝶装和包背装发展而来的，装订时将印页依中缝折正，使书口对齐，书前后加封面，打眼穿线即成。其明显特征是装订的书线露在书外。线装装帧在中国传统的装订技术史上最为先进。首先，线装书便于翻阅，不易散破，用线固定，做到了牢固长久。其次，加以用硬纸和布面作的书套，或用上下两块木板以线绳捆之，以利保护古书。

在大展第一展厅，我们经眼了一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清乾隆内府写、源阁四库全书本、清张廷玉等撰的《明史三百三十六卷》，存五卷。《明史》凡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传二百二十卷、目录四卷，记载了自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1368）至明思宗朱由检崇祯十七年（1644）二百多年的历史。书中的校讎标记和签条，为修订留下的痕迹。是书为清修《明史》定本之前的一个修改底本，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书前护叶中有两张防蠹纸，橙色，古代称“万年红”。古代护页在南方多用“红丹纸”，这是一种含四氧化铅成分的药纸，有效的避免古籍遭到虫蛀及其鼠啃的侵害。南方在装帧书籍时也很少加包角，也是因为其潮湿因素避免吸引虫蛀。这本古籍是用双线麻绳订眼的六眼线装书，材质和线装形式均为特殊，其自身牢固程度和受保护程度也可想而知。还有一种不常见的五眼线装，它是在书背处垫薄竹签，加固书的同时又不失弹性。然而，在这本书的首页中间，有一方官府印章，不仅清楚的交代了收藏地点，还钤印在卷端，这枚大印章不易被作假替换，保护了书的原貌及特征。护叶上钤盖印记，表示内府对印鉴的高度重视，同时也能充分宣誓主权，显示皇家的威严和“皇统”地位。所以说盖印记也是一种保护古书的方法，使得古籍一脉相承，源远流长。

古籍装帧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的载体,影响至深。它不仅能体现前人对古籍的重视,同时也对古籍的保护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更揭示出中华民族精益求精、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可贵精神。(本文作者系山东艺术学院2019级文物鉴定与保护古籍保护方向专业硕士研究生。全文由山东省图书馆副馆长、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李勇慧指导完成。)